东方智慧的现代魅力

DONGFANG ZHIHUI
DE XIANDAI MEILI

田文棠 杜乃俭 许允贤 黎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东方智慧与现代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 辕田文棠著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圆韵韵愿

摇ISBN 猿缘苑原员园园园原园园园原园园园原园愿

摇Ⅰ援东…摇Ⅱ援田…摇Ⅲ援传统文化 原研究 原中国摇Ⅳ援员园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陨孕数据核字（圆韵韵愿）第 园愿园园愿号

东方智慧的现代魅力

作 摇 者摇田文棠摇杜乃俭摇许允贤摇黎摇光

出版发行摇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员园园号摇邮编 苑园园园园园）

印摇摇刷摇陕西省乾兴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员园园园毫米伊员猿园园毫米摇摇猿员开摇摇员园园印张

字摇摇数摇圆韵园千字

版摇摇次摇圆韵韵愿年 苑月第 员版摇摇圆韵韵愿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摇员园园园册

书摇摇号摇ISBN 猿缘苑原员园园园原园园园原园愿

定摇摇价摇员缘援园元

导语 :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为在“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这里,他对民族复兴与文化繁荣的相互关系作出了极其深刻地阐述,并将文化的繁荣和兴盛看成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其实,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来看,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的复兴始终是民族复兴这一伟大工程的主要内容和前提。因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复兴。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自 员怨世纪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再度复兴的伟大业绩所一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强大、强盛、自尊、自信而又令世人仰慕的中国。且不说先秦时期那些辉煌灿烂的历史遗迹。仅就秦汉以后而言,由于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四海一统,大道同一,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发展,遂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威震四海,雄视天下,在世界文化和文明史上,引领风骚,彪炳史册。所谓“ 道风儒骨 ”、“ 大气开明 ”的“ 汉唐雄

风”和“汉唐盛世”，不仅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荣誉和功利，而且也使近现代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从而成为鞭策和鼓励他们反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复兴中华文明、重建中国文化的巨大动力。

然而，曾几何时，强汉盛唐的光荣，却被近代丧权辱国的耻辱所取代，往日的辉煌也一并成为灰飞烟灭的记忆。宋明以后，由于落后生产方式的惰性逐步加强，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其保守封闭性的一面占据上风，以及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桎梏日显沉重，致使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衰败，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清王朝后期在政治统治方面的异常严酷，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极端无能，在文化政策方面的死守旧道，都充分显示了王朝末期“气数已尽”的种种痼疾。以鸦片贸易为前导、以洋枪洋炮为后盾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军事侵略、文化侵略，正是在清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接踵而来。由此，割地赔款，开放门户，任人宰割，丧权辱国的民族悲剧也就在神州大地不断上演。这是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及其腐败无能所必然导致的严重结果，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民族和文化复兴的伟业中所永远难忘的奇耻大辱和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

综观从 [illegible] 年鸦片战争到 [illegible] 年我国改革开放一百多年民族和文化复兴的历史，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以古今矛盾和中西碰撞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冲突，即中国社会如何从贫穷走向富强、从传统走向现代，亦即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归根结底，也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期间，西方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其中最具历史影响且最有冲击力的主要是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导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进而导致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诸列强不平等对待中国所导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而引起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转换；第三次则

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再次涌入，在彻底批判和清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抵制”全盘西化“和”精神污染“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进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经济和新型文化的发展道路。

以上三次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因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的根本不同，其必然造成的后果和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也就完全不同。如果说，其中的前两次冲击，是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中国国门，用其强势的军事和文化力量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袭击，以达最后灭亡中国的政治目的。那么，这种侵袭的必然后果只能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造成极度地摧残，也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但第三次中西文化的对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平等互利、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主动进行的一次跨国界、跨文明的文化交流新尝试，旨在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

为什么在前两次的中西对阵中，中国传统文化因抵挡不住西方文化的进攻而败下阵来，犹如鲁迅先生所说只能让自己躲进草丛，舔干身上的血迹，准备再去战斗。而第三次中西文化对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不但是在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兴经济实体的中国，又主动将自己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之中，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感受经济一体化的跳动脉搏。

这是因为新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必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开辟出无限广阔的道路；也是因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重要保证，增添了勃发的生机和催进的活力。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克服重重困难，排除种种险阻，历经近猿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文化复兴的新的成就。

需要全本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近30年来，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无论是在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提高素质，增强活力方面，也无论是在培育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软实力体系方面，都作出了突出成绩，为中国和平崛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智力保证。各种跨越国界、跨越区域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诸如丰富多彩的“文化周”、“文化年”的举办和开展，为坚持独立自主和全方位和平外交，推进各国之间多方面交流合作，铺平了道路，从而也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应当说，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复兴所迈出的最坚实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展望未来，我们虽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同样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文化复兴的路程依然很长很长。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正在强力地促进着世界文化格局，向着多元共生共荣、优势互融互补的新型架构发展变化，中国文化的生态平衡也将向着现代形态不断倾斜和转变，其文化传统的严格界阈亦将逐步地被冲破，代之以新的更富时代性的人文内涵。这就是说，当今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已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出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人文思潮需要我们去考量、研究和认真对待。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要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和人文思潮迅速作出理性和科学的反应。

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在我们民族文化内部，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破坏，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出现某种程度的“崩解”和“断裂”。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引起关注的深刻教训。

综观世界风云变幻和普世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向，要完成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在

当今世界,对人文现象的关注,对人文因素的关注,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和重要倾向。圆21世纪以来,人类一方面正以超越自然空间的种种手段建构着无与伦比的文化系统(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又从纷繁复杂的人文现象和人文因素中重新发现人类自己的创造伟力,已经造成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而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能不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自己的欲望奢求和价值观念更新变迁的新的途径。

这就是说,对人的人文关怀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人的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的真实守护和关爱。因为人的生命家园是靠地球生物圈,即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来维系的;而人的精神家园则是依靠族群文化圈,即传统的民族文化系统来维持发展。这样,关爱自然、关爱生命、关爱文化、繁荣文化,就是对人的最大关爱,也是人文关怀和人文思想所应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的繁荣复兴,更应在这些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因为“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道家的生态智慧和“崇俭去奢”的思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关爱生命、关爱自然的优良传统,都应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新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的繁荣复兴,还要在守护和建设生命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同时,大力加强体现核心价值的主流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和谐文化的建设,以增强凝聚力,增强吸引力,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培育现代文明新风。为此,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推动文化在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应当说,这是繁荣文化、复兴文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要完成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实现多种文化的交流合作。人类自进入圆21世纪以来,所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和

社会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心灵情感却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虽然千姿百态，但其合理的内核却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因为各民族的不同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对人类进步曾经作出贡献，应该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开展广泛有益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应对人类所面对的种种新的情况。

当前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正在进一步促进着世界文明和多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应当说，21世纪将是世界多种文化相互对话的时代，其显著的特征和效应就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多元文化将在比较、融会、批判、汲收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所以流行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并不全面，因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要求不是搞“文明冲突”，而是必须开展全球合作。因之，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都应受到尊重。各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指责或干涉内政的借口。应当在相互谅解相互包容中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以建立多元文化之间的友好信任和相互合作。

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并利用这一大好机遇，积极开展跨国跨界和跨越文明的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大力推进文化创新，让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和容易为世人所接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更快地走向世界。这是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应该认真对待。

最后，要完成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要实现普世文化的融会互补。这里所说的普世文化或普世文明，并非是说，全球范围只有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而是多种民族文化或多种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荣，和平共处。这是全球多种文明和多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那种认为普世文明或普世文化最后必然走向完全趋同，甚至

只有一种强势文明或强势文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一些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就是坚持这种看法，其目的无非是以此作为坚持对外扩张的借口。

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绝对地排斥文化趋同或文化趋异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多种文化或多种文明通过交流合作，可以达到相互汲取外来文化或现代文明中有益营养和有利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补己之不足。这也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先在儒道互补，后在中西互补中不断求得新生和发展的。在当今新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中国文化更应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合作，以诚恳虚心的态度，更多的学习和汲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和现代元素，加以融会整合，以便形成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新型文化模式，使中国文化能够尽快成为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新文化。

上篇摇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

援

一、儒家伦理与东亚文明

以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作为其文化基石的东亚文明,在经历了早期辉煌之后,面对近现代工业文明及全球化的强力冲击和挑战,曾一度衰落,几遭苦难,方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前景。这里仅就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价值魅力及其未来拓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

东亚文明,是一个表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且历史形成的区域性的文化发展概念。著名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东亚”概念除了地理和人种含义外,更包含着文化的含义,“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化圈”,“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① 这就是说,东亚文明这一历史范畴是指一个多样统一、有机组合的文化

①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员猿圆年版,第员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发展实体，是指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通过多方面的交流沟通，使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扩散到周边东亚各国，形成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在内的“中华文化圈”或“东亚文明秩序”。而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秩序的形成，不但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而且，始终保持了文化交流的不间断性及文化内含的相一致性。直到 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亚地区之前的千余年间，东亚文明这一文化格局和文化态势一直基本保持未变，并成为规定东亚各国文化发展趋势和历史变迁轨迹的重要因素。

东亚文明又是一种由东亚诸国共同参与创建的独特的文明形态。东亚文明的主要成员国，除中国之外，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东亚文明的创建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早在汉唐时代已经达到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阔的高峰，而且，儒家的伦理学说及人文精神，已经处于统治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样，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倾注于孔子的儒家伦理，并按照各国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接受、诠释、汲取、融合儒家思想，形成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民族儒学文化。因此，东亚文明，又被称之为“东亚儒教伦理”或“东亚儒教文化圈”。这说明，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东亚文明的合理内核，分别被东亚诸国的民族文化汲收融合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东亚文明形成的进程来看，朝鲜乃至韩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因为朝鲜早在其“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即在公元 源–苑世纪左右，已经大力吸取中国文化，传播儒学思想，而且，比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涌现出一些儒学思想家。对于儒家学说，朝鲜儒学家特别重视仁和孝的思想，认为孝是先天的，是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绝对准则，主张以孝的精神忠于国王，认为家国一致，孝忠一致。这与孔子儒家有关“仁”论的思想基本相符。后来，到了高丽王朝，特别是 员缘世纪至 员愿世纪的李朝时代，朝

鲜朱子学的兴起发展，使“儒家思想在朝鲜达到鼎盛”，[①]并被宣布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孔子被称为“素王”，儒学无异于“国教”，儒家思想得到空前的普及。李朝时代朝鲜（韩国）朱子学中，以李滉、曹南冥为代表的主张“理气说”的退溪学派，与以李珥、赵光祖为代表的主张“主气说”的栗谷学派之间的辩论，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儒家学说。可以看出，朝鲜（韩国）不但较早地汲取了中国文化，而且也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韩国儒家学派，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著名儒学思想家。因此，朝鲜（韩国）成了“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

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虽在儒学的本土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将儒家思想作为 苑–愿世纪时，圣德太子推行新政、制定《员苑条宪法》及后来仿唐改革之“大化改新”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在吸取引进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上却有着不同的考量，竟在政治层面将儒学引向与其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向。

儒学传入日本要比朝鲜晚几个世纪，而且是经过朝鲜半岛的中介才传入的。在初传阶段，儒家思想是在宫廷内部皇族子弟和部分贵族中流传，未被视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直至宋学传入以前，日本只是片面不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儒学又是依附于佛教而在日本传播和发生影响的，其传播的广泛性与影响的深刻性都受到限制。在儒学的应用方面，日本儒学虽然也将“和为贵”、“礼为本”、“信是义本”等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员苑条宪法》立国、立民、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内容，树立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和伦理体系，这使日本在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层面，确实受到儒家“五常”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政府机构和政

① 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 猿缘缘页。

治层面却颠倒了“仁”与“忠”的次序，忽略“仁”而强调“忠”。按照中国儒学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仁”是作为人格的最高点，治国的最高理想（“施仁政”、“行王道”），儒家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日本儒教的五个美德却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其主要范畴是“忠”而非“仁”，这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中国儒学的“勇”也是相对处于次一层次地位，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说仁可以产生或派生出勇。日本儒教，却以勇敢为主要美德，并成为武士阶级所尊崇的最高层次的美德。对此，路易斯·弗洛伊斯撰著的《日欧比较文化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日本武士在夸耀自己脸上的刀疤（向疵）的同时，却可以鄙视脑后的伤痕。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士庶官僚的儒家思想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武士阶级的儒教国家。”弗洛伊斯的这个结论，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肯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军刀》中，对日本只有耻辱感而无罪恶感的描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后来，日本又将这种武士道式的“忠诚”，与其“国家神道、天皇崇拜”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直接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服务。这种所谓的“忠诚”实际上已与儒家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东亚文明的另一个成员国就是越南。对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越南人陈重金在其《越南通史》一书中这样说道：“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后，这些教更形兴盛。”可见，无论是“北属”时代或自主以后的越南，儒学的传播都比较普及，而且成了越南传统文化思想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传播，主要以越南为中介，通过商贸和文化交流，以及大量移民或“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以至影响到海外一些国家，从而将儒学传播的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形成地域辽阔、影响深远的东亚文明。

（二）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

如果说，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再现了作为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东亚农业文明，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历史辉煌；那么，东亚文明的现代发展，则展示着东亚工业文明拥入时代潮流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从东亚文明的历史形成和现代发展中我们更会惊奇地发现，作为东亚文明重要文化支柱的儒家伦理，不但推动了东亚农业文明的形成发展；而且，在近现代以来东亚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行程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又总是同儒家伦理自身的现代转换和现代重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及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儒家思想，虽然也曾遭受了很大冲击，并不再占据东亚各国统治意识的正统地位。但传统儒家思想中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儒学的现代转换中逐渐被扬弃、被革新。这样，渗透到东亚各国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深层结构中具有新的生命活力的儒家伦理和文化价值，就构成各国国民性的重要成分，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支撑现代东亚工业文明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人文资源和强大文化力量。

同东亚农业文明的缓慢发展相比，东亚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东亚诸国及一些地区，在先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坚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其经济发展规模也随之而不断扩大，都远远超过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最高纪录。

[illegible]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东亚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日本在二战以前，由于实行“明治维新”，坚持“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早已进入工业化国家，但在侵略战争中一败涂地，战后的重建实

际上是第二次现代化，到了 90 年代日本又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继日本之后飞速发展的是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 60 年代的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拉美中下水平的国家和非洲一般国家，属世界贫穷国家（地区）之列，但到 80 年代末则已进入世界中等发达水平之列。自 1965—1990 的 25 年间，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8%。继“四小龙”之后，中国内地坚持改革开放，连续 15 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9%，这种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实属罕见。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一跃而成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大国。

东亚地区经济的相继崛起，不但显示了东亚工业文明的新生命力，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其现代化进程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独创性的特色，从而对战后几十年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由此，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开始思考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的相互关系。因为，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属于中华文化圈，同是深受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对东亚工业文明与东亚儒家伦理相互关系的这一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主导西方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趋向的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作出了断然否定的结论。在他看来，西方由于它的新教伦理精神，才产生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反，中国的儒家伦理没有西方理性的向外发展精神，也没有自我得救、道德自主、人同宇宙之间的紧张等精神体验，人同宇宙之间的矛盾几乎化解为零，结果使中国人丧失了挣脱传统规范的内在动力。在韦伯看来，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学基础，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韦伯的这一论断长时间被西方学者奉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圭臬，同时，也禁锢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思想。但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及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使韦伯的论断受到了严重挑战。许多学者甚至日本、韩国学者也针锋相对地作出了新的判断，东京外国

语大学教授中岛峰雄就非常肯定地说“儒家学说是当今东亚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中的毋庸置疑的重要因素。儒家学说是他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源泉。”①韩国学者金日坤也认为,“儒教文化圈的巨大经济潜力,来源于全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因为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仍是社会的核心文化”②。

我们再来看看东亚诸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认识。日本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员怨愿怨年一次讲话中主张“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员怨愿苑年愿月,他在自民党一次政策研讨会上又曾指出,为了协调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必须把日本引上“中庸”的安全航道。日本的许多企业家为了发财致富,更是热心于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求智慧,以便确立自己的营销战略和构建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其中最受欢迎的典籍是《论语》、《孟子》、《大学》、《孝经》,《老子》、《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也受到欢迎。日本松下电气公司商学院,还开设了商业道德课,专门讲授“四书”等中国传统经典,将儒家学说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熔于一炉。有的竟将“和为贵”、“礼为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格言,作为劳资之间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条。韩国的商界更重视家庭道德、血缘意识、伦理观念,诸如“相助共生”、“勤奋诚实”、“孝敬节俭”、“为人正直”等优良品质的培养。相对而言,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社会礼俗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至今仍保留较多,并对他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

① 中岛峰雄《东亚“儒家文化区”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员怨怨缘年第缘期,第缘源缘页。

②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缘年版,第员圆员-员源员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